

全球智库半月谈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评估：全球经济变化带来的挑战

中国的全球投资仍在上升，美国面临艰难选择

安倍经济学五周年回顾

人工智能是贸易政策的新前沿

再论国际贸易领域的中国冲击

共和党如何控制债务

本期编译

安婧宜

曹园

侯书漪

李笑然

单敬雯

史明睿

申劭婧

童鸾

伊林甸甸

杨茜

张舜栋

(按姓氏拼音排序)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主编的中国社科智讯数据分析报告的组成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为您提供。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主 任	张宇燕			
首席专家	张 斌	开放宏观		
团队成员	刘仕国	欧洲经济	徐奇渊	中国经济
	吴海英	对外贸易	曹永福	美国经济
	冯维江	新兴市场	肖立晟	国际金融
	高凌云	对外贸易	熊爱宗	国际金融
	梁永邦	宏观经济	杨盼盼	国际金融
	常殊昱	国际金融	史明睿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 长	张宇燕			
召集人	徐 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 峰	国际战略	徐 进	国际安全
	薛 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 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 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 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 燕	俄罗斯政治
	任 琳	全球治理	丁 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联系人: 史明睿 邮箱: iwepceem@163.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 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3 邮政编码: 100732

联系人: 许怡 邮箱: naonao0619@163.com 电话: (86)21-50815287 传真: (86) 21-50815265

通讯地址: 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600 号 24 楼 2409 邮政编码: 200122

免责声明:

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所有, 未经版权所有人许可,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有违反, 版权所有人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译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评估：全球经济变化带来的挑战 7

导读：本文分享了作者对于中国产业政策趋势、美中关系中的利益与挑战、技术向中国扩散的看法，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的全球投资仍在上升，美国面临艰难选择 10

导读：2017年，来自中国和美国两方面的限制使得中国在美投资呈下降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美投资的萎缩。2018年，中国对美的私人投资可能增加，投资领域可能也会部分转移到新兴领域。与此同时，美国需要做好应对中国投资的准备，尤其是针对中国企业不受美国法律限制的问题。

安倍经济学五周年回顾 13

导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2012年上任，并提出了“安倍经济学”，至今已经过去5年了。所谓“安倍经济学”，即基于货币宽松、财政刺激和结构性改革的“三支箭”(three arrows)。5年过后，“安倍经济学”效果如何？我们整理了最近的一些观点。

人工智能是贸易政策的新前沿 17

导读：人们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但一般的用户可能不知道AI是由贸易协议进行管理。迄今为止，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数据流由已经过时的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进行管理。欧盟和北美的贸易政策制定者正在努力把人工智能与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联系起来，以获得信息跨国界的自由流动，帮助培训人工智能系统的大市场，以及限制跨境数据流动的能力，以保护公民免受潜在的伤害。

采访华为如何看“即将来临”的待中美贸易战 20

导读：据预测，特朗普总统会在近日宣布关于知识产权和技术转移的对华制裁政策，将两国将进入贸易战争。华为作为世界上最成功的信息和通讯公司之一，被指会对美国电信公司造成巨大威胁。一旦特朗普当局开始在世界贸易组织投诉中国，中国也可能成立类似组织进行反抗行动，两国可能会进入一场持久的贸易战。

全球治理

布宜诺斯艾利斯 WTO 贸易部长级会议不容乐观 22

导读：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国贸易部长12月初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晤，此时，贸易规则自由化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是面对制度挑战，部长们没有承诺要改革落后的世贸组织规则，或放宽现有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壁垒，情势不容乐观。

聚焦中国

再论国际贸易领域的中国冲击 25

导读: 国际贸易对美国国内就业机会的影响, 是一个受到美国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问题。关于国外进口导致美国损失就业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栋, 但关于美国受益于国际贸易, 并通过扩大出口从而创造就业的研究则相对有限。笔者在近期发表的两篇文章中, 使用工具变量法和全球进出口总额平衡法估算了美国国内劳动力市场受益于国际贸易的岗位增加数量。作者认为, 从总体来看, 美国无疑是国际贸易体系的受益者。尽管来自中国的进口冲击确实减少了美国国内的制造业就业, 但美国的其他行业却也同时受益于出口扩张。

中国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 29

导读: 最近几个月来, 中国金融系统的监管当局采取了多项措施, 全面加强对互联网金融领域的监管力度。中国当局为什么在目前这个时间点选择加强监管? 这种中央化、强监管的态势又会对中国的互联网金融企业产生哪些影响?

经济政策

共和党如何控制债务 32

导读: 美国乔治·布什总统持续的预算赤字以及随后的金融危机和奥巴马经济刺激措施, 使得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率从 2002 年的 32.6% 暴涨到 2016 年的 77%。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 预计, 到 2027 年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将膨胀到 91.2%。大多数人意识到当前的政策是不可持续的。应建立适宜的财政规则替代现在实行的“债务上限”。严格而透明的财政规则可以改善政策的运作, 约束政治家的行为, 灵活渡过衰退和不可预见的情况。关键是要找到规则之间的最佳位置。本文总结出十点经验教训。

战略观察

美朝战争会爆发吗? 35

导读: 本文详尽分析了美国与朝鲜开战的可能性, 作者期待打破僵局, 找到最符合人道主义的解决方法。

了无新意的南北会谈 40

导读: 2018 年 1 月 9 日, 韩国和朝鲜代表在板门店举行高级别会谈, 讨论朝方派代表团参加平昌冬奥会、南北关系改善等议题。此次会谈是自 2015 年 12 月朝韩副部长级会谈之后双方首次政府间会晤, 也是朝韩关系解冻的第一次试探性接触。作者认为金正恩的“新姿态”只是千篇一律的老生常谈, 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该地区的紧张局势, 但此次谈判难以就南北关系问题取得实质性成果, 毕竟朝鲜领导人从未打算真正放弃核武器。

叙利亚战略：蒂勒森必须寻求外交影响力 42

导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 17 日在加州斯坦福大学发表演讲称，美国、欧盟和地区伙伴国将不会向处于阿萨德政权控制下的任何地区提供重建需要的国际援助。只要阿萨德政权下台，美国将乐于促进叙利亚与其他国家经济关系正常化，不仅如此，美国还会施压其他国家帮助叙利亚重建。作者认为，美国政府需要正视叙利亚的重要性，制定具有合理性的战略，包括一份明确的声明和一项真正的承诺，对内消解公众疑虑，对外提升外交影响力，探求行之有效的手段和途径以解决叙利亚问题。

本期智库介绍 44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评估：全球经济变化带来的挑战

Scott Kennedy /文 单敬雯/编译

导读：本文分享了作者对于中国产业政策趋势、美中关系中的利益与挑战、技术向中国扩散的看法，并提出了政策建议。编译如下：

主要观点：

中国的产业政策虽然存在着浪费和低效率，但在促进本国的技术发展、从美国和其他国家获得技术方面是有效的。所有迹象都表明，在未来几年，中国将进一步加强政府中产业政策机构的地位，而不是推进实质性的市场化和自由化改革。

中美关系虽然存在许多问题，但是平衡的经济关系对美国经济是有益的。与此同时，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利益存在冲突，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经济与安全关系的困境，预计这种紧张局势还会持续。

美国的技术通过投资、贸易、就业和教育等多种渠道扩散到中国。政府可能通过某一种渠道限制技术扩散，但不能阻止其他所有渠道。

考虑到这三个因素，美国的政策需要做出以下调整：（1）关注那些可能会损害美国国家安全、中国尚未掌握也难以自主研发的技术；（2）明确哪些技术扩散路径更容易被控制；（3）需要增强与盟国关于技术控制政策的协调性；（4）采用具有高度针对性的政策，避免对美国经济的活力造成损害。

1、中国产业政策的现状

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上台后，中国的产业政策出现了新的趋势。第一，产业政策力度加大，目的是让中国的企业在几乎所有可以想象的先进技术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制造2025”是“十三五”规划中的重中之重，为中国企业在本土的技术和供应链市场份额设定了较高的目标，例如到2025年，电动汽车市场占有率达80%、工业机器人占70%、先进医疗器械占70%；第二，中国的投资规模大幅增长。除了政府直接投资在增长之外，国家还利用政策引导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公司和研究机构为政策优先发展的部门投资；第三，产业政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战略协调性。最高领导层更多地利用党和国务院监督下的“领导小组”来减少官僚机构间的冲突，同时各种产业政策工具在运用的过程中也日益协调。第四，中国加大了通过全球化服务于国家产业政策目标的力度。在过去几十年，中国派出了数百万学生到国外取得工程和科学的高级学位，同时还加大了境外投资和收购海外公司的力度。

展望未来，有迹象表明，中国将继续沿着服务经济和战略目标的产业政策路径前进。原因在于，尽管过多的政府干预造成了浪费，但至少从领导层角度来看，产业政策已经取得了“足够的成功”——中国的经济增长比历史上其他经济体更快更持久，中国的企业在价值链上的地位在提升，在国内外占据了更大的市场份额。

2、美中经济关系中的利益与挑战

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既为美国经济带来了利益，同时也带来了挑战。中国的产业政策使美国公司在中国和第三世界市场中处于劣势，但是迄今为止，美国经济总体上受益于与中国的关系。两国商品和服务贸易量每年超过 6000 亿美元，双向投资大幅增加，这不仅为美国公司创造了利润，而且也为数百万工人创造了就业机会，为消费者提供了便宜的货物。如果中国减少歧视性政策，那么这种关系对美国会更加有利。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途径是想办法限制中国的产业政策，而不是切断与中国的经济关系。

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运作逻辑与经济政策完全不同，目的是尽可能保护美国，公平与平衡并不是典型的原则。尽管从商业的视角来看，技术转移是完全合理的，但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则可能并不合理。美国正面临着难题：美中经济关系如此密切，但是中国在价值链上地位的迅速提升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了隐患。中国半导体、量子计算、人工智能、新材料、能源储存、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努力可能会让美国公司感到头疼，但那些负责确保美国国家安全的人则更加担心。

3、向中国的技术扩散

中国正通过多种途径与世界进行技术接轨，包括吸引外国投资、在海外进行投资、进口、聘请外国人到中国公司和研究机构工作、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通过网络等手段盗取国外技术。

这一事实产生了两个结果。第一，希望获得技术的中国公司有很多可行的途径，如果投资的途径被封锁，那么他们还可以通过进口、挖员工等其他方式获得技术。同样的，如果一种技术存在于多个国家，那么中国企业也可以通过国家间监管环境和水平的差异来获取技术。第二，政府当局可以从完全商业或私人的交易和活动中获益。并不是所有的外国技术获取都是产业政策的一部分，许多贸易和投资活动是完全私人的，不需要产业政策机构或国家安全机构的批准，特别是科研中心，但是这种私人经济活动完全有可能被政府利用，以服务国家安全。

4、政策建议

建议政策制定者关注以下几点：

第一，美国应该把重点放在限制那些可能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技术转移上，且这些技术目前中国尚未掌握也难以自主研发。

第二，将 CFIUS 的职责范围扩大到其他形式的投资，甚至应该审查那些外国投资者只拥有少数股权的投资，特别是涉及到高新技术的。但是，不支持扩大 CFIUS 对美国对外投资的审查范围，虽然对外投资是技术转移的一个重要途径，但这一审查并不切实际。

第三，美国应该考虑其他的政策和立法选择，以解决美国技术向中国和其他地方转移的问题。应当更新美国出口管制规则，不仅应管制物理技术和知识产权，还应关注那些被外国企业雇佣的美国雇员。

第四，美国需要加强与其欧洲和亚洲盟友的协调，以限制技术向战略竞争对手不适当的扩散。制造业和创新的全球化未来只可能会扩大，因而必须提高政策协调性。

第五，虽然防止不明智的技术扩散是重要的，但美国也从开放经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这对维持美国的软硬实力至关重要。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谨慎关注调整技术投资对美国经济和未来潜在生产力增长的净正面影响。

本文原题为“Evaluating CFIUS: Challenges Posed by a Changing Global Economy”。本文作者 Scott Kennedy 为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弗里曼中国研究部副主任。本文于 2018 年 1 月刊于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的全球投资仍在上升，美国面临艰难选择

Derek Scissors /文 申劭婧/编译

导读：2017 年，来自中国和美国两方面的限制使得中国在美投资呈下降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美投资的萎缩。2018 年，中国对美的私人投资可能增加，投资领域可能也会部分转移到新兴领域。与此同时，美国需要做好应对中国投资的准备，尤其是针对中国企业不受美国法律限制的问题。编译如下：

2017 年，中国在全球的投资受制于各国中央政府关于限制中国投资者的提议。这似乎暗示了中国全球投资将大幅缩水，官方统计数字也支持了这一结果。然而，实际的情况正好相反。从可获得的最佳证据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海外投资在 2016 急剧攀升之后，2017 年依然保持了中等水平。

美国企业协会的中国全球投资追踪系统（CGIT）是唯一一个完全公开的关于中国外向投资和工程的记录。CGIT 显示，2017 年中国对外投资增长了将近 9%，而这一成绩很大程度上依靠价值 430 亿美元的瑞士农业技术巨头 Syngenta 收购案。如果没有这宗交易，总投资将下降超过 16%。不过，即使没有这单交易，2017 年的总额依然在该记录上排名第二。

表面的数据总是比实际更乐观一点。没错，交易的数量减少了，在许多国家和部门的投资总额也降低了。但是数字显示，中国投资兴盛的局面没有衰落，而是改变了，即转移到国有企业的巨额交易和新兴部门上。这种投资在 2017 年已经登上了英国和新加坡的头版头条。

中国的投资总额经常被其海外的铁路和港口工程推动上涨。然而，尽管工程活动价值很高，但它并不能像投资一样使中国拥有所有权。工程合同的总价值平均来说比较小，但是 2005 年以来，超过 1 亿美元的工程合同数量要多于超过 1 亿美元的投资，今年中国就与将近 60 个国家签订了价值 1 亿美元以上的工程合同。这也是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核心，而这些投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交通领域。

一带一路计划下，2018 年的海外工程情况应该与之前基本相似，而这一年的主要问题是中国政府是否允许私人企业更加激进的投资，以及美国政府在多大程度上会对中国的收购加以干预。2017 年底，中国的私人投资已经又一次开始上涨。诚然，它不可能被允许再创 2016 年的疯狂，但是今年有可能仍然有所增长，这也会抵消国家投资的减少。

中国投资的下行风险已经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发觉。CFIUS 已经拒绝及时批准数目可观的中国交易。加上中国国内的限制，2017 年中国在美国投资减少了一半，已经低于 250 亿美元。关于拓展 CFIUS 权利的两党提案已经受到了全球的关注，而 CFIUS 也已经在涉及到消费者数据的领域阻碍了中国的并购。这象征着一个艰难的权衡：外国投资带来的明显的收益和中国法律规则的欠缺。

2018 年，美国需要清晰的识别新旧风险。一个早已有之的风险是中国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的区别。美国要明白，中国政府的控制力在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上没有区别。私人企业在具体运营上受到的干预较少，但是在涉及到存活问题时，它们与国有企业一样受到政府的关注。因此在涉及到国家安全方面，不应该将其与国有企业区别对待。

另一个古老的问题就是互动。毫无疑问，长时间以来中国市场一直不如美国开放。美国不想像中国一样关闭某些市场，也不想中国政府许诺开放已经过度饱和的市场（如钢铁）。此外，即使中国对于增强互动回应积极，特朗普政府对于帮助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也兴趣索然。

而一些新问题则与投资更直接相关。去年已经出台相关法律，规定经济净利润不再考虑 CFIUS。然而这是不对的。包括中国的外国投资在美国起到了维持和创造新工作岗位的积极作用。假装这一因素不存在似乎是为了减少竞争，放慢并政治化了投资过程。事实上这种法律应该被废除的。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考虑。CFIUS 的责任被大幅，甚至有点过度提升，目前这也已经成为两党两院的关注点。不过即使如此，它对国家安全也给予了适当的考虑。美国不应该因为中国的所作所为就阻碍其他国家的投资。然而，中国获取先进技术的努力的涉及到的国家，强度和精细程度都不断增加。美国的最佳反应可能会招致广泛争议，不过强有力的回应是必须的。此外，行动为时已晚，因此我们不应对未来改善给予过多期望。

此外，近年来中国企业非法获取知识产权（IP）和数据的案例也屡见不鲜，这构成了中国企业的另一风险。正因为美国的法律在中国不适用，因此涉及到个人数据时中国企业不能被完全信任。中国的实体在涉及到非法获取 IP 时应当被制裁，美国方面也应当保护好自己的军事技术。当然，大部分中国企业也并非招人讨厌的，它们也会使美国经济获益，这点也是美国对国外投资政策的核心。美国现在必须找到一条既能包括针对中国的特殊限制，又不伤害自身及长期投资伙

伴的道路。中国是一个全球经济参与者，全球合作无疑是其下一步计划。但是首先，美国必须在自身选择上保持明智。

本文原题为“Chinese Investment Still Rising Globally; Tough Choices for the US”。本文作者 Derek Scissors 是美国企业协会（AEI）的资深学者，他也是中国经济黄皮书的主要经济学家。本文于 2018 年 1 月刊于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安倍经济学五周年回顾

Silvia Merler/文 李笑然/编译

导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 2012 年上任，并提出了“安倍经济学”，至今已经过去 5 年了。所谓“安倍经济学”，即基于货币宽松、财政刺激和结构性改革的“三支箭”（three arrows）。5 年过后，“安倍经济学”效果如何？我们整理了最近的一些观点。编译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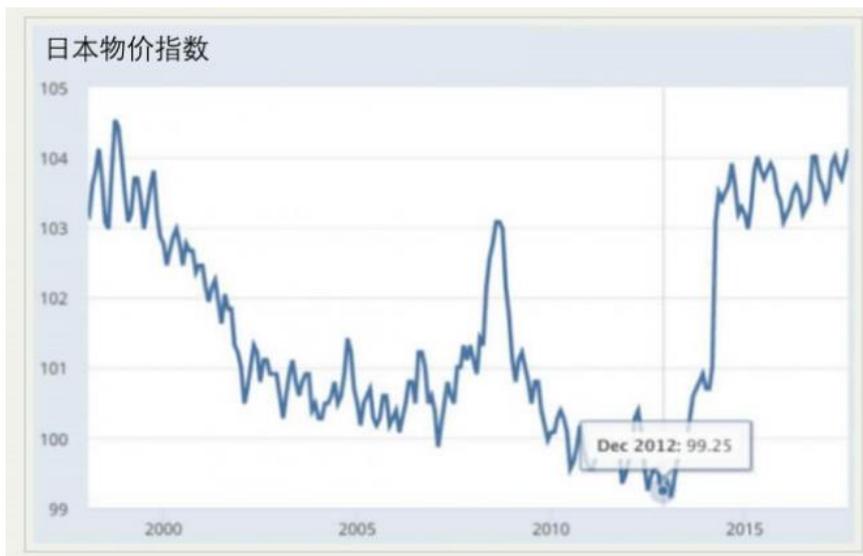
《经济学人》指出，5 年过后，日元贬值 30% 左右（以美元为准，与 2012 年 11 月相比），日经 225 指数上涨 150% 以上。这刺激了经济增长，日本的 GDP 连续 7 个季度保持正增长，这是日本 16 年以来最长的一次连续增长。其中，出口的贡献最大，而私人投资在过去 5 年间的增长也超过了 18%。同时，尽管人口方面的趋势并不乐观，但就业仍增长了 2.7 个点。不过，通货膨胀并未得到改善：消费者价格（生鲜食品除外）增幅仅为 0.7%（截至 2017 年 9 月）。通货膨胀疲弱的一个原因是，工资的上涨速度不如预期那样快，而这一定程度上和日本的大部分工人是终身制的，且工资结算主要依据生活成本而定有关。第二个原因是，劳动力在增加。越来越多的女性、老年人和外国劳动者加入劳动力市场。此外，随着劳动力成本不断升高，一些公司也开始通过投资劳动节约型技术的方法提高生产率。

图 1 日本名义 GDP



支持货币幻觉学说的学者 Scott Sumner 认为，“安倍经济学”最重要的影响在于名义 GDP，而名义 GDP 在安倍选举之前一直呈下降趋势。根据货币主义理论，名义 GDP 走强有助于解决两方面的问题：过高的债务负担和周期性失业。“安倍经济学”成功的解决的这两方面的问题。失业率降至 23 年来的最低水平（2.7%），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重趋于平稳（此前近几十年的时间持续飙升）。价格增速在过去 5 年中的表现也强于安倍执政前，不过远低于 2% 的目标（图 2）。

图 2 日本物价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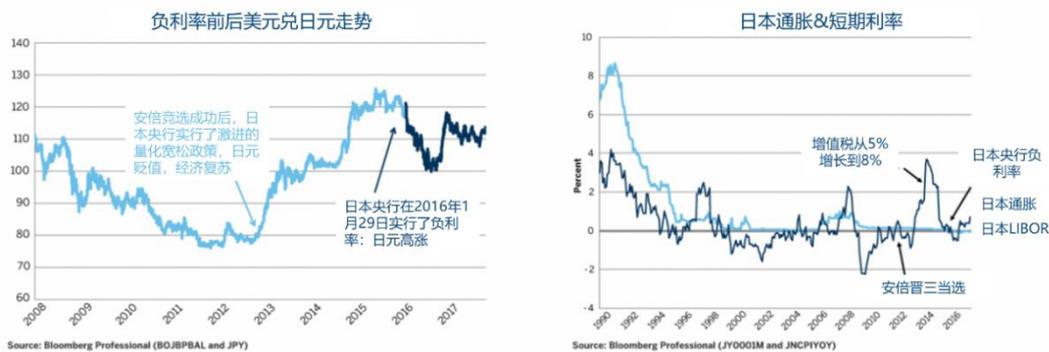
来源：[货币幻觉](#)

此外，Sumner 还指出，1%的水平太低，日本央行（BOJ）应进一步放松银根，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日本官方的通胀目标是 2%，官方的通胀目标一旦设定，其货币政策就需要保证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否则可能会导致未来的潜在危机）。第二，Sumner 认为，日本央行将利率作为政策工具的做法是愚蠢的，因为即使 2% 的通胀率，在日本也并不高到足以避免经济衰退期间的零利率下限。因此，日本的情况很奇怪，它并不需要货币政策刺激，但日本央行却必须采取货币政策刺激。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日本央行一旦失去信誉，日本可能随时陷入经济衰退。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 Erik Norland 认为安倍经济学“革命尚未成功”。2012 年以来，日本经济已经有所改善，但在 2015 年初开始放缓，而日本央行关于短期负利率的尝试似乎并未取得成功（Norland 认为负利率阻碍了日本回到正通胀水平）。2013-2014 年间约一半左右的暂时性通胀飙升可以归因于增值税的增长（从 5% 增长到 8%），尽管这不是主旋律。关键的问题在于增值税从 8% 提升至

10%，虽然这将增加预购买活动，但可以暂时缓解通胀飙升的作用。安倍竞选时回避的另一个问题是核能问题。安倍政府已经允许部分恢复核能的使用，这会限制日本的预算赤字，并减少日本对原油和天然气的需求增长。目前，受益于良好的国际环境，日本实现了 2007 年以来首次与全球同步增长。未来，主要的风险来自中国——日本对中国和香港的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高达 25%，从而积累了巨额债务。Norland 认为，尽管可以改善经济表现，但日本的高债务水平可能会拉低短期利率。

图 3 美元兑日元走势、日本通胀及短期利率走势



来源：[Erik Norland](#)

Lechevalier 和 Monfort 认为，在过去的 5 年里，安倍政府的积极主动的政策是扭转日本经济放缓的关键因素。但距离政策目标还有差距，主要体现在价格走势和 GDP 增速两方面。长期看，作者认为无法对日本在未来 20 年的经济增长模式给出清晰定义。由于缺乏结构性改革，因此当前政策对于提高国家增长潜力的作用有限，因此“安倍经济学”最终可能失败。

Shaori Shibata 持有相似的观点。他认为构成“安倍经济学”的那些凯恩斯式的补救措施未能解决日本的长期需求疲弱问题，尤其是在私人消费方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安倍经济学”的自由化措施，而这些措施与奉行的凯恩斯主义药方不相容。尽管“安倍经济学”有潜力(至少在短期内)提高日本企业的盈利能力，但在没有相应举措将企业财富重新分配给工人情况下，“安倍经济学”也对日本未来的经济增长构成了威胁。

Heizo Takenaka 认为，这些发展背后反映了安倍政府制定政策的几个特点。有许多政策可以成为本届政府的潜在遗产——对社会保障体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以防范社会分化；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基础设施——个人身份识别系统的重大改革；加强特许计划以满足新的基础设施需求。不过，Takenaka 认为，尽管

经济已经明显改善，但仍存在许多严峻的挑战。财政整顿和振兴区域经济的努力依然迟缓；收入差距的扩大没有得到解决；尽管经济有所改善，日本在世界上的竞争力却进一步恶化；而日本大学的国际排名一直在下降。总体而言，最主要的是，尽管“安倍经济学”已大幅提振了经济，但它仍未充分应对全球其它地区正在发生的快速变化。因此，Takenaka 预计，政府将为子孙后代展开更大胆的经济改革。

本文原题为“Abenomics, Five Years In”。本文作者 Silvia Merler 为 Bruegel 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宏观、金融经济学、中央银行和欧盟机构政策制定。本文于 2018 年 1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人工智能是贸易政策的新前沿

Susan Ariel Aaronson /文 史明睿/编译

导读：人们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但一般的用户可能不知道 AI 是由贸易协议进行管理。迄今为止，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数据流由已经过时的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进行管理。欧盟和北美的贸易政策制定者正在努力把人工智能与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联系起来，以获得信息跨国界的自由流动，帮助培训人工智能系统的大市场，以及限制跨境数据流动的能力，以保护公民免受潜在的伤害。编译如下：

大量的跨境数据流在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但其规则尚未进行公开讨论。

人们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 (AI)——即能够执行过去只能由人类完成的任务的机器、系统或应用程序。

回想一下你早晨的例程序：**Google** 智能助理会检查日程表并提醒你今天有会议。然后你浏览 **Twitter** 新闻，它使用算法更新网页——关于特朗普、贸易和技术的最新消息出现在网页的最上方。智能手表会对你的健身进行指导，并告知你的进步和潜力。在你打开 **Netflix** 看剧时，它会根据以往的观看历史为你推荐一些惊悚片。

市场统计数据显示，大约 57% 的消费者期望有语音功能的智能助理在 2020 年之前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届时，85% 的客户交互将没有人工管理。

就像我们依赖人工智能一样，许多由 AI 支持的应用程序和设备都依赖于跨境数据流进行运作。每天都有大量的数据通过互联网跨越国界，在个人、企业和政府之间流动，从 **Siri** 到谷歌。由于所有这些数据流动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商业交易相关联，所以它实质上是用来交易的。

但一般的 AI 用户——那些依赖于 **Google** 助手、**Twitter** 精选或智能手表等机器学习的人可能不知道 AI 是由贸易协议进行管理。否则，调查显示他们可能对隐私、信息披露有更严格的要求，以及对企业如何使用算法和公开生成的数据要求全国性的讨论。

公众需要这些信息来评估算法是否被不道德地使用，或者具有歧视性（有利于某些特定的人群），又或被用来操纵人们——就像最近的选举那样。

迄今为止，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数据流动由在因特网发明之前起草的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进行管理。由于规则最初是为了管理软件和电信服务起草的，它已经过时。今天，欧洲和北美的贸易政策制定者正在努力把人工智能与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联系起来。他们希望二者的结合可以获得信息跨国界的自由流动，帮助培训

人工智能系统的大市场，以及限制跨境数据流动的能力，以保护公民免受潜在的伤害。

截至 2017 年 12 月，只有一项贸易协定，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CPTPP, 前身是 TPP)包含明确且有约束力的语言来管理 AI 的跨境数据流。具体而言, CPTPP (目前仍在谈判中) 规定数据自由流动是默认的, 要求各国制定规则以保护提供数据的个人和公司的隐私, 禁止数据本地化 (要求在本地服务器中生成或存储数据), 并禁止各方要求公司披露源代码。这些规定反映了 11 个缔约国之间的共同观点: 推动跨境数据流的发展, 不允许各国私有化信息的要求。

美国 (已经退出 TPP) 想要确立更明确的与 AI 有关的条款。其贸易官员最近提议, 目前还在重新谈判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应包括禁止授权披露算法和源代码的语言。美国希望确保其企业不会被要求泄露源代码或算法, 以防止歧视、虚假信息或破坏其公民就个人信息自主权做出决策的能力。即使其他北美自由贸易区缔约方认为这样做是合法且必要的。

与大多数贸易协定一样, CPTPP 和 NAFTA 也包括例外情况, 各国政府可以打破这些协定中的规则, 以实现合法的国内政策目标。这些目标包括保护公共道德、公共秩序、公共卫生、公共安全以及与数据处理和传播有关的隐私的规则。但是, 政府只能在必要的情况下使用例外规定, 并且以尽可能少扭曲贸易的方式进行, 而不是为了达到政府的目标对信息的转移施加限制。政策制定者需要更清楚地了解他们如何以及何时可以采取这些措施来保护其公民。

在这方面, 欧盟正在成为领路人。

欧盟成员国已同意在数字单一市场共享资源并进行共同管理, 为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创新提供财政支持, 并制定明确的保护个人信息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

欧洲联盟还在支持数字单一市场的条例中, 对使用算法规定了限制。第 21 条允许任何人有权选择退出算法管理。第 22 条允许公民对由算法制定的法律或类似的重大决定进行质疑。

但是这些规定提高了获取数据的成本, 并可能扼杀创新和竞争。此外, 一些欧洲法院已将这些规则解释为适用于全球互联网, 而不仅仅只限于欧盟。一些公司认为这是“治外法权”的一种形式。

虽然欧盟在建立数字单一市场和鼓励公众辩论方面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但成员国尚未同意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协定中确立管理数据流和人工智能的条款。

决策者担心其他国家会试图淡化欧洲保护隐私的方法和赋予公民挑战使用人工智能的权利。

显然，欧盟在监管方面的做法并不反映北美的观点。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新谈判开启了北美地区对如何鼓励推动人工智能的跨境数据流，同时保护公民的信息不被算法滥用的讨论。鉴于加拿大致力于人权，且其在机器学习方面的相对优势，他应该带头行动。

本文原题为“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Trade Policy's New Frontier”。本文作者 Susan Ariel Aaronson 为 CIGI 全球经济项目的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8 年 1 月刊于 CIGI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采访华为如何看“即将来临”的待中美贸易战

Daniel J. Ikenson / 文 安婧宜 / 编译

导读：据预测，特朗普总统会在近日宣布关于知识产权和技术转移的对华制裁政策，将两国将进入贸易战争。华为作为世界上最成功的信息和通讯公司之一，被指会对美国电信公司造成巨大威胁。一旦特朗普当局开始在世界贸易组织投诉中国，中国也可能成立类似组织进行反抗行动，两国可能会进入一场持久的贸易战。编译如下：

据预测，特朗普总统会在近日宣布关于知识产权和技术转移的对华制裁政策，将两国将进入贸易战争。华为回应了这些猜测：在过去十年中，华盛顿和北京一直在进行一场针锋相对的技术贸易战。目前，这场战争正在升级。

最近一次争锋相对发生在周一，一直以来为其出售华为生产的智能手机计划做准备的 AT&T 公司，宣布放弃该行动。如果历史会重演，那么 AT&T 可能会被迫利用美国政策制定者的方案，来改变电信业的进程。

尽管中国科技公司一向被指不尊重知识产权和国际投资贸易准则，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政策制定者开始关注中国技术。2006 年以来，北京颁布了自主创新政策，使得中国公司越来越重视发展和登记知识产权。在 2009 年，美国商会发布了关于中国的产业政策报告，并认为中国政府有意“借鉴”西方技术。

近期，北京批准了一项 1600 亿人民币的投资，以帮助缩小半导体行业中国和世界领先水平间的差距。政府还颁布了两项新的法律，即网络安全法和网络安全法，旨在收紧特定领域数据和技术控制来确保信息是“安全可控”的。美国公司认为，网络安全法中模糊的指代和语言给了中国当局太多决定权，当局可以要求公司分享源代码和其它专利信息，以进入其他市场。被迫的技术转移一直以来被美国公司所诟病。

同时，中国为争取技术领先地位而发布的“2025 中国制造”计划使得美国政策制定者倍感危机，而中国兼并了许多美国（或其它国家）的技术公司也被认为别有用心。上周，中国蚂蚁金融兼并美国速汇金公司的决定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否决，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也成为过去一年中国尝试技术兼并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障碍。

这与华为有什么关系？非但没有将决定权交给世界贸易组织，美国选择禁止向中国技术公司进口，而中国公司也更难兼并美国技术公司。过去几年间，华为——世界上最成功的信息和通讯公司之一——对中国政府（无论是真实还是想象的）违法行为都负有责任。

2008 年，华为参与美国 3Com 公司的竞标，却被美国政策制定者和外国投资委员会禁止了，其原因为交易如果达成，将会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2011

年，美国众议院常设特别委员会发起了针对华为和 ZTE 公司的调查，认为它们威胁到美国通讯网。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公司——尤其是希望参与联邦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通讯公司——比如从中国进口器械和原材料。但是报告没有给出任何证据，只有旁敲侧击的影射。

报告发布六个月以后，美国的立法者决定禁止美国政府机构购买中国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同年，因为支持日本通讯公司对 Sprint Nextel 的兼并，外国投资委员会要求购买者 Softbank 公司将中国信息和通讯产品剔除出供应链。并且，若 Softbank 公司想要重新启用中国公司，需经过美国的批准。同样的情况在接下来的几起并购中都发生了。

尽管未有报告展示其负面消息，华为还是被美国政策制定者驱逐出了美国市场。他们警告美国的通讯公司，如果与华为合作，那么他们会失去巨大的市场。

华为产品遍布全球，与英国电信在英国电信网络筹建与服务中展开了深度合作，这会对英国国家安全造成影响吗？AT&T 公司希望通过放弃与华为合作来兼并 Time-Warner 公司的方案可行吗？

对于那些认为一旦发现调查结果违反 301 法案，特朗普当局就会报复中国的人来说，值得注意的是报复已经开始了。美国政府认为中国企图通过抢占美国技术和市场来完成其科技革新。此举不仅会使人们对网络安全的概念产生偏差，更会影响创新、合作、经济增长，并终究威胁全球贸易系统。

一旦特朗普当局使用 301 法案调查中获得的证据在世界贸易组织投诉中国，而北京也可能会设立一个类似的组织来反抗美国对于中国科技公司的限制，这些都可能会发生。这样的结果或许会最终演变成一场持久的贸易战。

布宜诺斯艾利斯 WTO 贸易部长级会议不容乐观

Jeffrey J. Schott/文 侯书漪/编译

导读：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国贸易部长 12 月初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晤，此时，贸易规则自由化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是面对制度挑战，部长们没有承诺要改革落后的世贸组织规则，或放宽现有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壁垒，情势不容乐观。编译如下：

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国贸易部长 12 月初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晤，会上，贸易规则自由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面对这个制度挑战，美国、中国、欧洲、印度和其他国家的自满令人不安。会晤中，部长们没有承诺要改革落后的世贸组织规则，或放宽现有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壁垒。

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有增无减。世贸组织的谈判已经过去了多年，毫无疑问，经过长达 23 年的疏忽，WTO 规则现在已经严重过时。大型区域贸易安排实际上已取代多边主义，推动了贸易和投资改革，并在电子商务、竞争政策、劳动力和环境等领域制定了新的贸易规则，但其中的许多举措目前也处于危险之中。最为严重的是，长期被视为贸易体系核心的 WTO 争端解决机制，被认为影响国家主权，这些偏见和担忧来自美国——二十五年前 WTO 争端解决机制程序的构建者和决策者。

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上，所有人都谈到要采取新的保护主义措施和减少现有的限制。即使实施反对保护主义措施的承诺并非全心全意，这些承诺也是过去 G20 和 WTO 声明（至少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前）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下三个例子能反映困扰贸易部长的问题。

首先，制定部长级声明的努力是美印之间关于如何处理长期搁置的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牺牲品。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希泽尔(Robert Lighthizer)坚持要放弃多哈回合，在更为相似的国家之间寻求更小的部门特定协定；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坚持要将多哈回合的重心放在农业和其他改革方面，以使自己的措施能够得到豁免。美国提出的在 WTO 内部推动部门谈判的建议是值得欢迎的，但除非多边主义能让主要贸易国家参与进来（如下文所述），否则很难成功。

其次，印度也要求豁免补贴规定，以便可以在不担心 WTO 诉讼的情况下补贴公共粮食库存。自 2013 年巴厘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以来，贸易部长们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一争端，并承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上达成一致，这次的失败是 WTO 在其他农产品贸易改革方面的主要障碍。

第三，美国、欧盟和日本暗中要求 WTO 迫使中国停止用以支持生产钢铁和其他产品的国有企业的政策补贴和其他歧视性做法。这一举措预示着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之间会出现更多的摩擦，并且在世贸组织中，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争议正在增加。。

平心而论，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还是有一些积极消息。部长们决定继续讨论渔业补贴的问题。尽管美国和其他国家已经在讨论制定有关电子商务领域和其他行业的多边规则（其中，电子商务领域的多边规则已经包含在区域协定，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中），部长们仍然将暂停适用于电子商务的关税的时间延长了两年。

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达成的“进步”举措都不太可能获得长足发展，因为这些举措需要能够制定新行业规则的主要国家的参与，而在吸引这些主要国家方面却面临着重大挑战。最近，WTO 部门谈判有关服务贸易协议（TiSA）的经验表明，在没有主要贸易国家支持的情况下，建设这种改革路径是困难的。即使像“环境商品协定”这样基本的免关税倡议也无法达到平衡的、自由化的结果。

请注意，在几乎所有情况下，美国和其他官员所设想的部门会谈都要求主要贸易国家参加，并改革自己的政策以造福他人。这一点很难做到，鉴于美国官员直言不讳地表示他们不会在新的贸易谈判中提供任何东西——而这就是他们“重新平衡”过去的贸易协定的方法。

因此，WTO 近期前景将受到限制。最大的四个贸易国（地区）——美国、欧盟、中国和日本——占世界商品出口总额的一半左右，服务出口的 55%，四者需要共同努力，才能在世贸组织中有所成就。他们都没有在 WTO 中起到领导作用。发展中国家相应地维持着站不住脚的谈判立场。几乎没有人愿意寻求实质性的解决办法：WTO 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Roberto Azevedo）以多种外交语言承认了这一点。

当然，如果四大贸易国都能承认自己在世界贸易体系中是“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那么 WTO 的谈判就可以继续。鉴于上述与中国的摩擦，这是一个不太可能的假设。

四大贸易国需要一个运转良好的多边体系，不断更新世贸规则，并调和、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他们曾试图全面改革世贸组织的权利和义务，但失败了；他们无法一起工作，或得到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来修改多哈或新的贸易回合。但是他们可以、而且应该在提高生产率、反腐败、增加所有 WTO 成员的贸易和投资机会

等领域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多边谈判。

为此，四大贸易国应该同意参与新的多边主义，这之中涵盖了他们中的一个或几个和发展中国家关注的问题。提出的问题包括投资、“绿箱”补贴（如促进可再生能源和减排技术）、电子商务、政府采购透明度、服务自由化和对争端解决程序改革。每一种多边主义都应该提供激励措施来促进最不发达国家的参与，并为加速发展中国家执行“贸易便利化协定”提供额外的支持。

多哈回合的工作计划已经失败，但可以设计一个涉及多边谈判的多哈回合谈判议程，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从中受益。最好的情况是，它可以开始 WTO 的革新过程；最差来说，它至少也可以防止成员国对多边贸易纪律新的侵蚀。

本文原题为“Troubling Complacency among the World’s Trade Ministers”。本文是作者是 Jeffrey J. Schott，他于 1983 年加入 PIIE，是国际贸易政策和经济制裁的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7 年 12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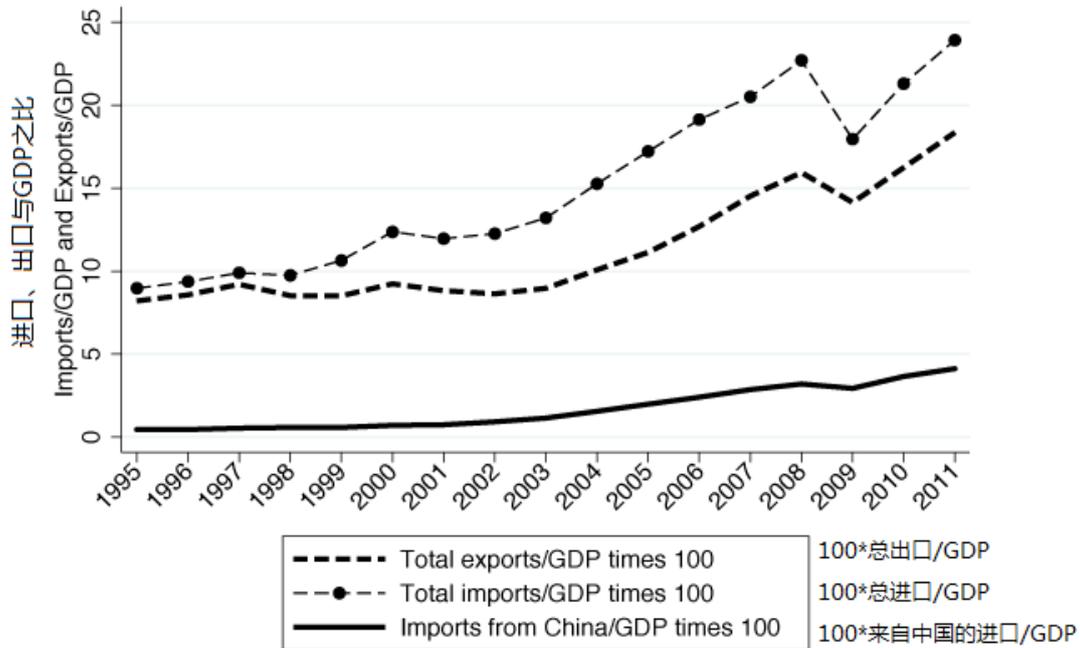
再论国际贸易领域的中国冲击

Robert Feenstra, Hong Ma, Akira Sasahara, Yuan Xu / 文 伊林甸甸 / 编译

导读：国际贸易对美国国内就业机会的影响，是一个受到美国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问题。关于国外进口导致美国损失就业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栋，但关于美国受益于国际贸易，并通过扩大出口从而创造就业的研究则相对有限。笔者在近期发表的两篇文章中，使用工具变量法和全球进出口总额平衡法估算了美国国内劳动力市场受益于国际贸易的岗位增加数量。作者认为，从总体来看，美国无疑是国际贸易体系的受益者。尽管来自中国的进口冲击确实减少了美国国内的制造业就业，但美国的其他行业却也同时受益于出口扩张。全文如下：

毫无疑问，在过去三十年间国际贸易领域中最大的变数，是中国的崛起。在 1991 年，来自中国的进口仅占到美国总的工业品进口的 1%，而到了 2016 年，这个数字已经猛增至 10%(Autor 等, 2016)。传统经济学的意见认为，国际贸易有助于降低商品零售价、提供更多类型的商品、将资源按生产力水平重新分配，并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从而使得各方从中获利，形成多赢局面。不过，近年来学界的关注点则更多集中在中国进口对美国制造业就业的负面冲击(e.g. Autor 等, 2013, 2016.; Acemoglu 等, 2016; Pierce and Schott, 2016)。比方说，Acemoglu 等 (2016)就通过估算认为，1999 到 2011 年间，来自中国的进口使得美国制造业损失了超过两百万个就业岗位。

然而，尽管关于国外进口导致美国损失就业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栋，但关于美国受益于国际贸易，并通过扩大出口从而创造就业的研究则相对有限。在当今的国际贸易体系中，美国是全球领先的出口大国——在 2014 年，美国的商品出口总额就达到了 1.6 万亿美元，仅次于中国。我们可以从图 1 看出，在 1995 至 2011 年间，美国的总出口占 GDP 比重从 8%增长到了 18%。毫无疑问，出口数据增长的背后，一定伴随着劳动力需求的扩张。在近期发表的文章中，我们使用工具变量法(Feenstra 等, 2017)和全球进出口总额平衡法(Feenstra and Sasahara 2017)，率先测算了美国受益于出口扩张而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



数据来源：Feenstra and Sasahara (2017). Data from the WIOD

图 1 美国的进口与出口扩张：1995-2011

在 Feenstra 等(2017)中，我们分别从产业层面和地方劳动力市场层面，实证检验了出口扩张给美国带来的就业增长效应。从产业层面来看，美国的出口扩张并不是均匀分布于各个产业的。在所有产业中，半导体、汽车和石油炼化这三大行业经历了最大幅度的出口扩张，而其他行业的出口增长则显得相当有限。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数据在产业层面有相当大的方差。考虑到任何行业都会同时受到出口增长带来的就业增加效应，和进口增长带来的就业损失效应，我们采用了由 Autor 等 (2013, 2016)提出的计算方法。此外，我们也综合考虑了出口和进口的综合效应在各地区间的分布差异。图 2 展示了 1991-1999，及 1999-2011 年间美国各区域受进口、出口冲击的影响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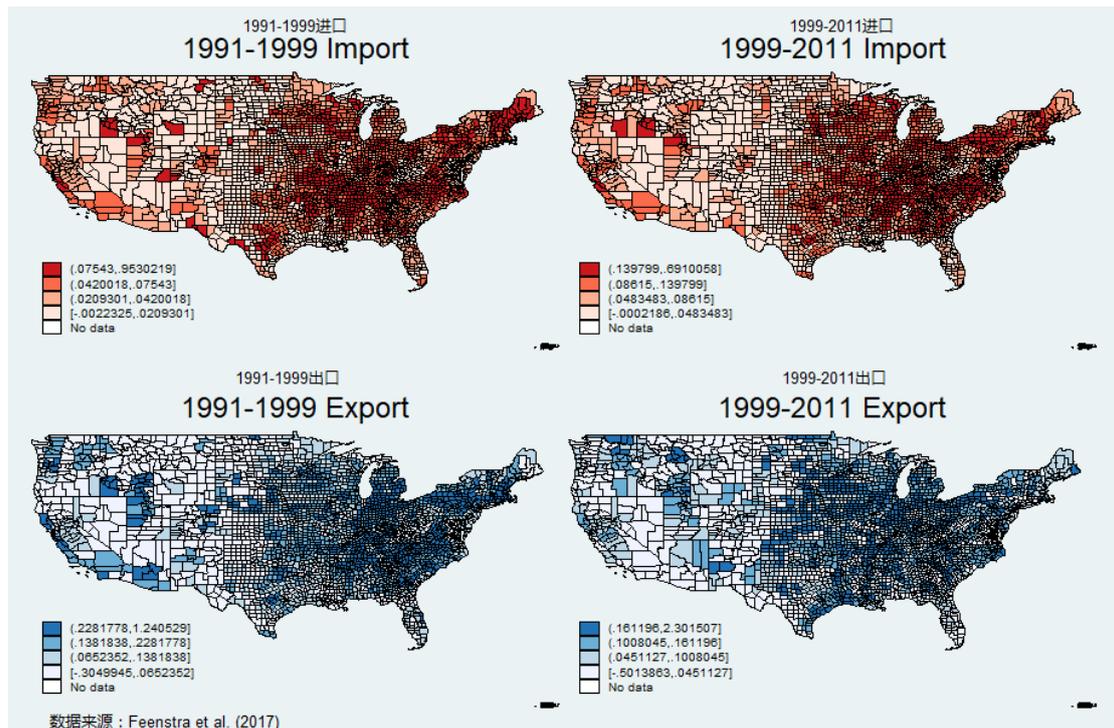


图 2 美国各区域受进口、出口影响的程度：1991-2011

从技术角度上讲，由于内生性的存在，我们很难得到对出口扩张效应的无偏估计。有许多国内的供给和需求冲击都是我们观察不到的，而这些未被观察到的冲击会同时影响出口和就业，从而给我们的估算带来偏误。引入适当的工具变量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在文章中使用了两个工具变量——一是其他高收入国家的出口扩张；二是基于出口模型预测的美国总出口值。

我们的实证结果显示，美国的出口扩张确实给国内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显著的就业增长。我们发现，尽管来自中国的进口冲击确实减少了美国的就业，但美国自身也从出口扩张中收获了可观的额外就业岗位。总体而言，在 1991 至 2011 年间，出口扩张带来的岗位增加效应基本抵消了中国冲击带来的工作机会流失效应，并使得总的就业净流失数仅为 30 到 40 万左右。

在我们的另一篇文章——Feenstra and Sasahara (2017)中，我们使用全球进出口总额平衡法估算了进口和出口对美国就业带来的影响。全球进出口总额平衡法的一大优势在于，我们可以更容易将结论扩展到其他行业，如服务业和资源类行业。总体来看，国际贸易给美国各个行业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净效果是不同的：举例来说，在 1995 年到 2011 年间，全美制造业净损失了八万多个岗位，而资源类行业净损失了超过二十五万个岗位。然而，如果我们把关注点放在美国的服务业劳动力需求，我们就会发现国际贸易为美国带来了显著的就业增长——在过去 16 年间，国际贸易为美国直接贡献了超过 103 万的岗位增长。显然，这足以抵消制造业和资源类行业的工作流失。总的来说，国际贸易给美国贡献了超过七十

万的工作岗位增长。我们在表 1 中总结了我们的两篇文章，以及 Acemoglu 等 (2016) 的相关估算结果。

	样本窗口	分析单位	来自中国进口 口的总效应	总的出口扩张效应减 来自中国的进口效应	总的出口扩张效应减 总的进口效应
	Sample period	Unit of analysis	Gross effect: US import exposure from China	Net effect: US import exposure from China vs. total export expansion	Net effect: US total import exposure vs. total export expansion
Acemoglu et al. (2016)	1991-2011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0.8 million job losses	80万就业岗位流失	
	1991-2011	Commuting zones	3 million job losses	300万就业岗位流失	
Feenstra, Ma and Xu (2017)	1991-2011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制造业	0.4 million job losses	40万就业岗位流失
	1991-2011	Commuting zones	地区层面	Roughly in balance	大致相抵
Feenstra and Sasahara (2017)	1995-2011	All industries	1.8-2 million reduction in job demand	4.5-4.8 million increase in job demand	0.7 million increase in job demand
			180-200万就业流失	450-480万就业增加	70万就业增加

数据来源: Acemoglu et al. (2016), Feenstra et al. (2017), and Feenstra and Sasahara (2017).

表 1 国际贸易对美国就业影响的总结

我们的结果与经典的经济学原理不谋而合——国际贸易为受益于出口增长的行业带来了就业增长，并且抵消了那些受进口冲击的行业的岗位流失。我们发现，尽管国际贸易直接导致了美国制造业工作机会大量流失，但美国的其他行业，如服务业，则大大受益于国际贸易。可以说，国际贸易对一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是基于其比较优势的。美国在服务业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因此，美国的服务业就业机会也就随着国际贸易的增长而迅速增加。

本文原题为“Reconsidering the ‘China Shock’ in Trade”。本文作者 Robert Feenstra 是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C Davis)国际经济系主任，Hong Ma 是清华大学经济学副教授，Akira Sasahara 是美国爱达荷大学(University of Idaho)经济学助理教授，Yuan Xu 是清华大学经济学副教授。本文于 2018 年 1 月刊于 VOXEU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

Martin Chorzempa / 文 张舜栋 / 编译

导读：最近几个月来，中国金融系统的监管当局采取了多项措施，全面加强对互联网金融领域的监管力度。中国当局为什么在目前这个时间点选择加强监管？这种中央化、强监管的态势又会对中国的互联网金融企业产生哪些影响？全文如下：

对于中国的互联网科技公司而言，自由放任的好日子已经时日无多了。在过去十几年间，像阿里巴巴和腾讯这样的中国互联网巨头，借着政策宽松的良好环境，创造和发展了一系列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商业模式。但是，在最近几个月内，中国政府正在逐渐加强对互联网领域的监管力度，这无疑会带来一系列深远的影响。有些学者担心，如果政府监管力度加强地过快，中国的技术创新可能会遭受损害，针对金融系统效率的提高也会受到影响，这种监管的加强甚至可能进一步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

对于中国的监管当局而言，最核心的问题是由以阿里巴巴和腾讯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所建立起的这套互联网生态内的金融系统是否安全和稳定。要知道，支付宝和微信所能帮助用户完成的，除了小额消费外，还有投资、申请贷款、购买理财产品，甚至呼叫出租车这样的服务。在这波互联网创业的大潮中，迅速成长起来的各类互联网金融公司已经创造了超过万亿人民币规模的贷款，而这些贷款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监管。

从李克强总理到一行三会的各级官员，中国政府的官员们一向高度评价互联网和新技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但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愈发重视对互联网领域的监管和掌控。近半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过，要严守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并逐步帮助中国经济摆脱对信贷扩张的过度依赖。中国当局已经开始着手对电子支付、信用评级，以及电子货币的首次发行（ICO）领域加强监管力度。总体来看，这些监管措施昭示着当局谋求在金融系统内施行更彻底、更严格、无死角的监管，并且全面掌握金融领域内民营企业的用户数据。

举例来说，在 2017 年 8 月，中国央行要求集中监管所有由第三方支付企业运营的支付工具。以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为代表的电子支付系统可以被总结为一个闭环：用户将银行里的资金提取到电子支付系统的账户里，从此以后在封闭的电子支付系统内自由转账，而这些转账则与传统银行系统完全脱钩。自 2004 年创立伊始，支付宝一直以上述的方式运转，并在 2011 年后经历了飞速增长。截止 2016 年，中国的电子支付系统年均处理超过 1000 亿人民币规模的转账请求，且每年增速超过 100%。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的监管当局对电子支付系统的安全

和稳定性日益担忧，同时当局也非常担心电子支付系统会损害传统支付渠道（如银联）的安全性。因此，更严格的监管也就势在必行了。

中国央行的八月新规使之得以获取更多上述电子支付系统转账的信息，并且强制要求国内的互联网巨头与监管当局共享用户数据。根据笔者得到的消息，除了监管当局外，大型国有银行也因此得以通过特定渠道获取这些信息，但笔者尚未证实这一机制具体是如何运作的。从 2018 年 1 月开始，中国央行再次要求第三方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集中交存比例由现行的 20% 提高到 50% 左右，由于这部分客户备付金无法支付利息，这一新规将大大打击现有第三方支付机构的盈利能力。根据估算，这条新规将使得中国的第三方支付机构每年损失超过 6 亿美元利息。

此外，中国央行似乎还正在考虑撤回原先拟批准八家金融机构（包括蚂蚁金服、腾讯、平安等）建立信用评级体系的决定。2015 年，中国央行曾计划在半年内批准这些金融机构自主建立其信用评级体系，但三年后的今天，这一决定依然迟迟未能公布。与此同时，由央行一名前任副行长领衔的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却早已拿下牌照，并建立了“信联”信用评级系统。包括蚂蚁金服在内的互联网公司在公开场合表示了对信联系统的支持，但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将手上的用户信息拱手让人。尽管这些企业并不情愿这么做，但现在监管部门的意见明显占了上风。这些现象显然意味着，中国互联网金融信用数据及支付信息的中央化、强监管时代已经到来。

中国当局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力度已经势在必行。监管层的这些新举措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2015 年 12 月爆发的 E 租宝事件，就向我们展示了所谓的金融创新一旦缺乏与之配套的监管措施，将会导致多么严重的金融风险。或许，在当今中国的监管者眼中，“互联网金融”这个词已经与泡沫和风险紧紧联在了一起。尽管在中国庞大的金融体系中，互联网金融所占的体量还显得相当有限，但监管当局已经明显将之视为潜在金融风险最大的来源。不过，除了管控金融风险外，中国的监管当局或许还有其他目的。数年来，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已经掌握了海量的用户数据和交易信息，毫无疑问监管当局也想将这些数据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中。

笔者认为，中国当局将会继续加强对互联网金融领域的监管力度，加强监管不仅是出于管控金融风险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帮助改革缓慢的银行系统不被互联网领域里新兴的竞争者们甩得太远。目前，我们还很难判断不断加强的监管力度是否会对中国的互联网金融企业产生严重的伤害。不过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巨头们似乎比较乐观。马云最近就评论说：“老实讲，我现在还没看到有任何对我们

不利的迹象。”不过，如果这种强监管的态势长期保持下去，那么逼迫中国传统银行业加强改革的动能可能确实会一去不返。

本文原题为“Beijing's Grip on Internet Finance Is Tightening”。本文作者 Martin Chorzempa 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的研究员。在加入 PIIE 前，Martin Chorzempa 曾在德国银行协会工作，并曾作为访问学者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和中国金融 40 人论坛从事过关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研究。本文于 2018 年 1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共和党如何控制债务

Ryan Bourne /文 杨茜/编译

导读：美国乔治·布什总统持续的预算赤字以及随后的金融危机和奥巴马经济刺激措施，使得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率从 2002 年的 32.6% 暴涨到 2016 年的 77%。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到 2027 年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将膨胀到 91.2%。大多数人意识到当前的政策是不可持续的。应建立适宜的财政规则替代现在实行的“债务上限”。严格而透明的财政规则可以改善政策的运作，约束政治家的行为，灵活渡过衰退和不可预见的情况。关键是要找到规则之间的最佳位置。本文总结出十点经验教训。编译如下：

英国的长期债务前景非常可怕，主要是因为它涉及人口老龄化与现收现付的国家养老金和医疗保健体系。但是在近期内，英国政府内部达成了进行财政约束和降低债务与 GDP 比率的共识。

不同于英国，美国乔治·布什总统持续的预算赤字以及随后的金融危机和奥巴马经济刺激措施，使得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率从 2002 年的 32.6% 暴涨到 2016 年的 77%——这一比率仅在二战之后达到过如此高的水平。

尽管由于军费削减和高增长导致债务急剧下降，但预测显示，美国债务占 GDP 比率在未来几十年将迅速上升。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到 2027 年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将膨胀到 91.2%。

之后的二十年中，由于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支出以及债务利息支出的激增，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预计将进一步上升至 150%。这个数字并没有考虑最近减税导致赤字扩大的影响。

大多数人意识到当前的政策是不可持续的。但迄今为止，国会一直不愿采取行动。他们想把借贷的成本分散到子孙后代。权利作为债务的主要驱动力似乎是不可触碰的。与此同时，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思想上存在分歧，阻碍了以往试图通过大型交易来缓解债务危机的途径。

然而，拖延行动只会恶化长期前景。如果要使 2047 年债务与 GDP 的比率回到 40% 的历史标准，则需要每年削减一定金额的开支，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3.1%（相当于联邦支出的 15%，不包括债务利息）。而要在 2028 年之前达到同样的目标，则每年需要削减的开支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4.6%。

因此，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去年年底委托国会共和党工作组提议进行预算改革以约束联邦债务。现在实行的“债务上限”显然是失败的，这一措施经济成本巨大，许多共和党人渴望寻求替代方案。

众所周知，政治家容易出现“赤字偏见”。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三十年中，多达 96 个国家对支出、税收、赤字或债务采取了长期限制，称为“财政规则”。

欧元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彻底失败，以及英国不断变化的财政目标都表明财政规则既不必要也不足以遏制债务。然而，精心设计的限制措施可以改善财政政策的运作，约束政治家的行为。

关键是要找到规则之间的最佳位置，严格而透明，这样才可以真正发挥规则的作用，可以灵活渡过衰退和不可预见的情况。

我阅读了有关美国各州和联邦政府、瑞士、智利和英国财政规则的大量文献。下文是我从其中学到的十个重要启示，共和党应该牢记：

1、需要政治意愿来实现财政纪律和维持规则，特别是在没有宪法支持的情况下。

各国政府，包括近期的英国和 20 世纪 80 年代的美国，当政府面临困难时，往往会放弃或规避规则。

2、规则必须有预防措施来应对经济衰退或差于预期的增长。

不灵活的规则例如严格的赤字目标或严格的年度预算平衡规则等在遭受冲击时往往会受到摒弃。“严格”的财政规定并不总是更好的。

3、财政规则应主要限制支出，因为这是政治家直接控制的变量。

税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的健康状况，其前景是不确定的。同样，赤字只是支出和税收的副产品。

4、通过在经济周期中平衡支出和收入，可以使得债务与 GDP 的比率下降。

如果经济达到潜力水平，就可以粗略地将支出上限设定为税收趋势或收入估计。两者都允许自动稳定器进行操作和借贷以适应经济状况，同时确保中期债务与国内总产值的比率下降。

5、设置的支出上限应包括所有花费，以尽量减少“创造性会计”。

很多证据表明有些政治家重新定义支出，例如把消费支出称为“投资”。

6、长期权益支出需要一个次要规则。

结构性平衡的预算规则并没有限制今天的政治家们为下一代制定更慷慨的权益。因此，为确保长期的可持续性，有必要限制新的权利承诺。

7、利用趋势估算收入的公式应更简单，更透明。

另一种预测潜在收入的方法，需要估计出一系列未知因素，包括经济潜力，以及收入对潜力走向的反应。

8、规则应该纠正未达的目标。

上限支出结果的偏差不应忽视。与瑞士的“债务刹车”一样，应该使用偏差来调整未来的支出上限，以确保总体预算在整个周期内达到平衡。

9、应增加一项明确的条款以应对紧急情况。

紧急情况下，应进行高门槛的投票，通过公认的途径重新达到平衡。

10、获得财政规则可信度的最好方法是尽快实施。

考虑到政治共识和新经济下滑的风险，在未来推动实现平衡目标尤其危险。应尽快确立规则。

共和党人有机会在未来几年实行支出上限的财政规则。他们应该听取这些经验教训，设法使债务与 GDP 的比率下降。这需要强烈的政治意愿，以及可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经济趋势的方法。

本文原题为“[How the Republicans Can Get Debt Under Control](#)”。本文作者 Ryan Bourne 是 Cato 研究所“经济学的公共认知”项目的 R.Evan Scharf 讲席。本文于 2018 年 1 月刊于 CATO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美朝战争会爆发吗？

David A. Welch / 文 童鸢 / 编译

导读：本文详尽分析了美国与朝鲜开战的可能性，作者期待打破僵局，找到最符合人道主义的解决方法。编译如下：

由于平壤的核武器和导弹计划，美国与朝鲜之间的紧张局势持续上涨，本周爆发了不寻常的口舌之争，自由世界的领导人和金正恩相互辱骂，各自吹嘘核按钮的大小。与此同时，朝鲜与韩国的外交热线已经重新开通。在外交沉寂两年之后，两国已同意在1月9日举行正式会谈，这可能是消除朝鲜半岛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的一个机会。

目前一些分析人士估计战争的可能性是50%。杰出的中国老将，王洪光中将，近日表示，“从现在起到3月份，朝鲜半岛随时可能爆发战争。”

每个人都知道战争是可怕的，但为什么还会爆发？一般来说，有四种原因：基于成本效益计算有意开战，无心的失误，公众舆论煽动，为同盟国出头。

可以清楚判断出，在目前美朝的僵局中，两国都没有民众煽动或为同盟国出头的可能性。爆发战争只可能是因为有意选择或者无心失误。

除非万不得已，没有一个理智的朝鲜领导人会选择和美国开战。尽管平壤的声势很大，但朝鲜目前绝无、未来几年也几乎没有可能让美国变成“火海”。另一方，美国，当然可以“完全摧毁”朝鲜。没有一个国家会发动没有胜算的战争——除非战争不可避免，国家为了免受失败的耻辱而选择为荣誉而战。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可能认为采取军事行动是对朝鲜最轻的一种惩罚。对美国来说，并非每个国家的核武器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比如英国。那么为什么特朗普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可能有两个原因。

首先，金正恩显然不是一个普通的领导人，他刺杀了他的哥哥，处决了他的叔叔，让高级军官在防空炮火中丧命，仅因为他们在金正恩进入会议室时没有立正或者在开会的时候打盹。在长时间被崇拜和赞美之后，像金正恩这样的领导人，往往开始认为自己就是正确的，并丧失了精准判断的能力。阿道夫·希特勒就是典型的例子。希特勒对自己无穷智慧的错觉最终成为二战中反法西斯同盟最大的优势，自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希特勒节节败退。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金正恩如此年轻就开始执政。金正恩可能相信他会成功完成祖父的夙愿，即在金家的统治下统一朝鲜半岛。如果他朝着这样的目标努力，朝鲜势必会与美国开战，并且拥有一个真正的强大战略核武器库。

如果金正恩是一个长期的重要威胁，现在该是防患于未然的时候了。最近朝鲜的导弹试验表明，金正恩几乎已经拥有摧毁美国城市的核能力。如果美国想阻止，还有一线机会。

到目前为止，非军事制裁已经无济于事，经济制裁、外交孤立、单纯威胁早就无法影响朝鲜核武器的规模和导弹计划的速度。显然金正恩没有去核化的打算。他把自身的个人崇拜和政治合法性都押在发展真正的战略核能力上。没有一个领导人愿意破坏自己的政治合法性。

第二个原因是特朗普不愿意比一个三十多岁的朝鲜朋克显得更没有男子气概。考虑到特朗普不断幼稚地强调“我的核按钮更大”，取笑金正恩是“小火箭人”，这个原因更像是在开玩笑。

美国和朝鲜会无意中开战吗？通常国家都会犯错误。偶然闯入别国的领空，海上事故，和其他军事失误引发的无非是谴责，要求道歉和不悦的符号表达。即使局势紧张，只要危机稳定，这些问题也相对容易解决。危机的稳定性与领导人在战争头炮打响时受到的压力成反比，而后者又取决于该国受到第一次攻击的影响，和对先动优势的估计。在危机不稳定的情景下，一个无意的冲突就容易被误读为开战，进而引发大规模的军事反应。

目前朝鲜的危机非常不稳定。朝鲜的军事计划完全在于先发制人。目前，维持朝鲜政权免受战争影响的唯一希望在于，是否能对美国及其同盟造成足够大的破坏，以至于让他们后退、选择谈判而非延续冲突。一旦平壤判断美国的攻击将要发动，朝鲜会立即重创韩国。同样地，美国知道让同盟和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免受可怕打击的唯一希望，就在于趁其不备，给予朝鲜重创。

幸运的是，目前美朝两方没有发生能引发战争的军事冲突。朝鲜没有采取境外行动，美国和韩国也都小心翼翼地避开飞越朝鲜领空。这意味着，如果战争爆发，很有可能是因为华盛顿蓄意发动。

特朗普政府有多少可能发动战争？特朗普本人是鹰派人物。在华盛顿，许多人认为一旦没有和平方式让朝鲜去核化，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和国家安全顾问H.R.麦克马斯特愿意支持军事行动。而且美国情报局声称朝鲜很快就能发展真正的战略核力量。

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是主要的鸽派人物。他本人对开战的前景表示担忧，也更加愿意采取外交和谈的方式。来自华盛顿的消息表明，蒂勒森已经邀请加拿大外交部长克里斯提娜·弗利兰·共同主持会议，会议将于1月16日在温哥华举行，主题是探讨朝鲜问题，此举是在向特朗普表明外交努力仍在进行——实际上，这是一种拖延战术。

近日金正恩向韩国伸出橄榄枝，很可能表示朝鲜政府也开始担心特朗普真的打算开战。除了挑拨华盛顿和首尔的关系以外，此举也给了像蒂勒森这样不肯放过任何外交手段的人一个有力证据。至少，几乎可以肯定金正恩的策略推迟了军事行动的时间表。

任何一个将军或历史学家都会告诉你：战争中没有任何事情是按计划进行的，所以很难准确预测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局势会怎样。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很大部分取决于谁先行动。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两种情形。

在第一种情形下，美国成功进行第一次打击。为了不被朝鲜察觉，美国必须从一开始就动作迅速。但是战争通常不会以这样的方式开始：通常备战需要数周、数月的时间，去组织疏散家属，布置武器，准备物资，重新部署军队。有时候国家公开备战是为了故意威慑，或发出强迫信号、期待不必攻击。但由于没有可能威胁朝鲜去核，美国将尽一切可能避免朝鲜拉响警报。

一种方法是在军事演习的掩护下准备战争。美韩会定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但可以预见的是朝鲜会做出歇斯底里的威慑。我们并不知道朝鲜会如何严肃应对军事演习掩护下的突然袭击，但是五角大楼的指挥官们宁愿不冒一丝风险，在朝鲜放松防备的时候发动突袭。

美国暗中备战的一个好处是朝鲜没有监视美国军事活动的 ability。它没有军事卫星，不可能监视和解密美国的军事通信，即使在韩国和日本的间谍网络可以观察和准确判断威胁行为，他们也难以及时、高质量地发出警告。信息不对称是美国享有的最大优势之一。正如1991年波斯湾战争所表明的，信息不对称可以转化为战场上不均衡的结果。

假如朝鲜能够收到高质量的早期预警，几乎可以肯定，预警来自中国或俄罗斯。这就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尤其是关于中国：如果北京有消息表明美国即将对朝鲜开战，是与平壤分享信息更加有利，还是保留信息？按理说，无论战争以何种方式爆发，朝鲜的迅速战败比韩国的大面积受害——韩国是中国的第四大

贸易伙伴——对中国更加有利。（据推测，美国军方一直忙于向中国保证在大规模军事冲突中，美军不会过于接近中国边界）

美国的第一目标，除了开火之外，是压制朝鲜的进攻力量。美国还将在行动开始时瞄准每一个已知的指挥所、导弹发射场、通信中心、油库和战略交通枢纽。当然，人们必须假定，朝鲜的指挥官已经预计到这些，并尽可能设计防守。

这种情形下最有可能的结局就是长达数月的战役。最后的阶段可能是中国介入稳定局势，有大片的朝鲜领土需要战后管理和人道主义行动，同时国际社会要考虑如何收拾残局。

尽管朝鲜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会竭尽全力投入战斗，令人担心的朝鲜军队十有八九会表现欠佳。正如最近在非军事区一个成功叛逃的朝鲜士兵所表明的，在出其不意的攻击并迫使朝鲜军队做出反应的情况下，他们并没有做好防守的训练准备和部署。如果希望首尔能安然无恙，那就太天真了，但是在防守情况下朝鲜的攻击力会大大小于进攻状态下。

到目前为止，没有理由担心朝鲜能够发射远程导弹，并能对着遥远的美国目标上成功投放核弹头。美国情报部门不确定朝鲜是否有能力控制装有核弹头的短程导弹的发射，为慎重起见，美国情报部门假设朝鲜有这样的能力。这种可能性将日本全境置于朝鲜的核范围内。然而，朝鲜旧一代的导弹却是出了名的不可靠，容易在飞行中爆炸。在遭受突然袭击和密集空中打击后，朝鲜定做核弹头，并与电池、燃料装配到火箭上，成功开火，完成这一系列都是技术活。

注意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关于美国使用核武器的假设。如果美国选择对朝鲜使用核武器，美国能够更有效地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最初的军事目标，但是带来的是国内和国际上无法接受的政治代价。此外，用核武器攻击朝鲜会导致大片区域需要战后重建和人道主义关怀。如果美国判定了朝鲜去核化的有利时机，几乎可以肯定美国只会使用常规武器。

在第二种情况下，朝鲜判定美国的第一次攻击是不可避免的，很可能也是迫在眉睫的。那么和第一种情况重复，朝鲜发动第一次攻击，但不可避免的是朝鲜要移动军队和器械到非军事区，值得怀疑的是他们能否成功制造 1950 年一样的“惊喜”。

朝鲜发动袭击的后果显而易见，仅仅是汉城的死亡人数估计就有几万到几十万，韩国经济的中心会受到广泛的损害。仍然活跃的朝鲜潜伏者们会带来破坏、恐怖主义、刺杀行动，局势会变得更加混乱。无论韩国和美国的军队如何抵抗，

朝鲜军队都会席卷非军事区，他们的铁蹄会一直南下。但不久以后，在某个时刻朝鲜的燃料会用尽，进攻可能会在 5 到 7 天慢慢停止。

从那时起，朝鲜将处于守势，会尽可能拖延时间，试图说服国际社会进行谈判，达成某些协议，协议至少保证朝鲜主权和维持金的家族统治地位。尽管任何核武器的使用都会使国际社会决议让金正恩下台，只要金看到一次不祥之兆，他就会考虑使用核武器，。

美国对朝鲜的核打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大量生命的死亡，大片土地的污染，将不得不需要战后重建和人道主义服务。如果美国使用核武器，除俄罗斯以外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核武器。

有没有避免朝鲜半岛开战的方法？最可能的解决方法是某些朝鲜高层领导人基于他们自身、家族和同胞的长久利益，自己动手解决内部事务，铲除金正恩和他的拥护者，并愿意与国际社会合作。可以想象在平壤一定有一些人已经这么想了，但是现在无法知道有多少人或他们能否成功策划一场不被发现的政变。

如果平壤自行解决的方案失败，另一个避免战争的方法是特朗普或金正恩撤军，接受此前声称不能接受的条件。特朗普要接受的条件是，忍受屈服于“小火箭人”的耻辱，允许朝鲜拥有核武装，这将导致大部分美国城市都处于危险中。金正恩要接受的条件是，放弃他坚守的执政合法性，接受和 2003 年的萨达姆、2014 年的卡扎菲相同的命运。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现状是难以维持的。不管怎样，僵局或早或晚必须被打破。让我们共同期待最少生命伤害的解决方案的出现。

本文原题为“War with North Korea: How Might It Break out, and What Would Happen If It Did? ”。本文作者 David A.Welch 是 CIGI 高级研究员，滑铁卢大学政治学教授。本文于 2018 年 1 月刊于 CIGI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了无新意的南北会谈

James Dobbins/文 曹园/编译

导读：2018年1月9日，韩国和朝鲜代表在板门店举行高级别会谈，讨论朝方派代表团参加平昌冬奥会、南北关系改善等议题。此次会谈是自2015年12月朝韩副部长级会谈之后双方首次政府间会晤，也是朝韩关系解冻的第一次试探性接触。作者认为金正恩的“新姿态”只是千篇一律的老生常谈，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该地区的紧张局势，但此次谈判难以就南北关系问题取得实质性成果，毕竟朝鲜领导人从未打算真正放弃核武器。编译如下：

金正恩最近提出的与韩国谈判的建议绝非史无前例。尽管这一提议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该地区的紧张局势，但这不等于金正恩已准备放弃核武库。

南北朝鲜之间长达60多年的对峙中多次出现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以及他的祖父金日成所发起的解冻行动。第一次是在1972年，当时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向韩国总统朴正熙示好。当双方关系最终破裂时，金日成也试图与美国进行直接对话，但未能成功。

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朝鲜和韩国以及平壤和华盛顿之间进行了多次交流。2000年，朝韩两国领导人金正日和金大中举行首脑会议，美国国务卿马德琳随后访问了平壤，并对克林顿总统提出邀请，至此双方关系达到了高潮。在乔治·W·布什的第一个任期内，两国关系又回到了冰点，但在其第二个任期却短暂升温。

朝鲜与美国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计划上，韩国则致力于解决1953年军事停战协议中的遗留问题，包括两个朝鲜的统一，以及在此期间双方的外交、贸易与其他事务安排。换句话说，该协议停止了战斗，但并未真正结束朝鲜战争。

事实上针对这些问题已经达成了许多协议。1994年，朝鲜同意停止导弹试验，并开始拆除其核设施。不仅如此，朝鲜还提议进行谈判，争取达成结束朝鲜战争的和平条约，并承诺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同意与韩国进行有限的经济、政治和民间交流。

这些协议后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平壤、首尔和华盛顿的领导层定期变更，导致政策发生了几次突发性逆转。在韩国和美国，人们都强烈反对与朝鲜修好。克林顿政府更是难以获得国会批准为其承诺的燃料油提供资金，以换取朝鲜同意关闭其核反应堆。协议还包括承诺提供轻水反应堆，鉴于韩国、日本和美国反对

其所涉及的费用，这将会是更大的挑战。美国政府还发现，从政治甚至法律上解除制裁要比让制裁生效困难得多。

朝鲜的后续行动也无法表现出其应有的“诚意”。暴力事件频发加剧了紧张局势，除此之外，西方国家还怀疑朝鲜生产和隐藏了炸弹级裂变材料，也就是说即使拆除其所有已知的反应堆，它还是会在一个秘密的未申报设施中进行铀浓缩。这种相互之间的不信任使得任何和解的努力都功败垂成。

鉴于朝鲜社会的异常封闭性，人们只能对其动机进行凭空猜测。从金日成到他的儿子金正日，再到这位伟大领袖的孙子金正恩，高层领导人的变化可能会推动政策的转变。但是，无论客观条件怎样变化，结论就是：尽管朝鲜一再承诺放弃核计划，但朝鲜领导人从未打算真正放弃核武器。

为什么朝鲜如此顽固地追求核武器，这也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多年来，平壤一直否认有这种意图。后来它宣称“拥核”是这样辩解的，朝鲜需要核武器抵御外敌，否则会沦为像伊拉克和利比亚一样悲惨的命运。可以肯定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朝鲜领导层就认识到，核计划是朝鲜与世界其他国家关系中唯一重要的谈判筹码，也是美国或其他大国认真对待它的唯一原因。

因此，金正恩的“新姿态”与他的父亲和祖父曾经发起的解冻倡议是相似的。尽管朝鲜领导人通常倾向于直接与华盛顿打交道，但朝鲜目前不能接受特朗普政府的谈判先决条件，即朝鲜首先同意放弃其核武库。因此，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达成了一致，后者去年竞选时承诺寻求与朝鲜进行和解。金正恩的提议也许会缓和紧张局势，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朝鲜政权的孤立，可能还会为最终与特朗普政府举行会谈打开大门。

然而，金正恩似乎不太可能同意交出核武器，包括拆除他的核设施和停止导弹计划。换句话说，最终提出的方案可能是某种形式的冻结，例如停止进一步的核试验和远程导弹试验等。早在克林顿时代，美国就一直拒绝这样的“表面”协议并坚持要终止朝鲜的核项目。朝鲜方面则经常作出取消核计划的承诺，但它从未以可核查的方式完全放弃该计划。

本文原题为“Nothing New From North Korea”。本文作者为美国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外交和安全主席 James Dobbins。本文刊于2018年1月12日RAND官网。[单击此处可访问原文链接](#)

叙利亚战略：蒂勒森必须寻求外交影响力

Jon B. Alterman/文 曹园/编译

导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 17 日在加州斯坦福大学发表演讲称，美国、欧盟和地区伙伴国将不会向处于阿萨德政权控制下的任何地区提供重建需要的国际援助。只要阿萨德政权下台，美国将乐于促进叙利亚与其他国家经济关系正常化，不仅如此，美国还会施压其他国家帮助叙利亚重建。作者认为，美国政府需要正视叙利亚的重要性，制定具有合理性的战略，包括一份明确的声明和一项真正的承诺，对内消解公众疑虑，对外提升外交影响力，探求行之有效的手段和途径以解决叙利亚问题。编译如下：

在特朗普政府执政近一年的时间里，有关解决叙利亚问题的战略仍然不多。当前事态发展也从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政治未来谈判转向了以俄罗斯为首的以安全为导向的谈判。国务卿蒂勒森上周在斯坦福宣布他将就叙利亚问题发表演讲，透露出制定叙利亚战略的意愿。战略制定需要行动力和资源，而蒂勒森对此尚未表态。随着叙利亚冲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对特朗普政府而言，提升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外交影响力势在必行。

蒂勒森的演讲勾勒出了美国政府希望在叙利亚采取战略的原因。这不仅是恐怖组织的活动中心，也让伊朗在黎凡特地区拥有了更多的立足之地。但这并不是美国应该关心的全部。蒂勒森忽视了大规模流离失所人口对叙利亚邻国造成的安全后果——最直接的是约旦和黎巴嫩人口过剩，也包括土耳其和美国在欧洲的一系列盟国。数百万人离开叙利亚给其他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负担，并助长了本土主义的政治运动。四面楚歌的盟友和胆大妄为的敌人一样令人焦头烂额。

蒂勒森表明美国在叙利亚有以下五个战略目标：确保该国不会成为针对美国的恐怖活动基地；支持叙利亚向后阿萨德政府过渡；削弱伊朗的影响力；遣返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防止叙利亚再次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但蒂勒森仿佛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他提倡加强外交手腕，但对使用什么手段来增强影响力只字未提。他承诺向从伊斯兰国组织解放出来的地区提供稳定援助，但他没有给出具体数额，并明确指出“稳定”不是无限期国家建设的同义词，也不是重建的同义词。他警告“美国、欧盟和其他区域伙伴不会向阿萨德政权控制的任何地区提供国际重建援助。”后者似乎会激励叙利亚人民和国际社会远离阿萨德政权，但如果与前一一份声明结合起来，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漏洞，而不是讨价还价的筹码。

军事状况同样堪忧。当前美国的军事力量大多部署在叙利亚东北部，该地区荒凉、与世隔绝、人烟稀少。蒂勒森宣称，美国的军事行动是无限期的，但他不

清楚这些军队应该做什么，他们应该为谁作战。在叙利亚，更重要的、需要开展行动的地区集中在靠近伊德利卜的西北部和位于约旦边境的西南部，那里聚集了该国剩余的大部分圣战战士，现在属于冲突区。

在土耳其人对长期与美国结盟的叙利亚库尔德部队阵地发起攻击时，美国军队的集体情绪正在恶化。土耳其是北约盟国，美国军队与土耳其军队的对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更糟糕的是土耳其似乎认为，与美国合作的叙利亚库尔德部队比伊斯兰法院联盟、基地组织或在该地区从事活动的任何其他国家行为者都更重要。叙利亚冲突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各方立场也正在变得更加强硬。看样子土耳其人并不打算妥协，以消除盟国的恐惧或模糊其未来的计划。很难掩盖这一基本事实：美国比它任何一个对手——阿萨德政府、土耳其人、俄罗斯人、伊朗人或地面上的任何战斗团体——都要安于现状，裹足不前。

蒂勒森的陈述缺少两个基本要点：第一，一个明确的声明。必须说服美国公众，叙利亚确实很重要。在同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无限期接触产生了好坏参半的结果之后，美国人对政府在叙利亚的行动深表疑虑。但是，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前提是美国必须作出承诺，毫无疑问，承诺离不开公众的支持。

第二，一项真正的承诺。它不仅涉及资金和部队，政府的努力同样关键。叙利亚在美国的全球优先事务清单上排在什么位置呢？这很难说，但蒂勒森的演讲暗示着它并不是很靠前。

当然，不能把所有的过错都归咎于蒂勒森。自从七年前反对阿萨德政权的起义开始以来，叙利亚就远比美国政府想象的要重要的多。虽然叙利亚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但这又能改变什么呢？

本文原题为“A Strategy for Syria: Tillerson Must Look for Leverage”。本文作者为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全球安全与地缘战略主席 Jon B. Alterman。本文刊于 2018 年 1 月 24 日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Chatham House)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简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1920年，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广场著名的查塔姆大厦内。是目前英国规模最大、世界最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其宗旨是“推动个人和组织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行全面研究，并提供政策参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与英国政府、企业、媒体和学术界均有着广泛的联系，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hatham House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2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6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

网址：www.chathamhouse.org/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2005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bruegel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9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 外交关系协会

简介：成立于1921年，是美国非政府性的研究机构，致力于对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CFR是一个由精英学者组成的组织，成立伊始就成为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囊机构，曾为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谋划策。该协会主办的《外交事务》杂志曾刊登过乔治·凯南、基辛格和斯坦利·霍夫曼等美国知名外交家、国际政治学者的论文。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FR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4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6名。

网址：<http://www.cfr.org/>

RAND Corporation (RAND) 兰德公司

简介：兰德公司成立于1948年，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在其成立之初主要为美国军方提供调研和情报分析服务。其后，RAND 逐步扩展，并为其它政府以及盈利性团体提供服务。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RAND 在全球(含美国) 30 大智库中列第 6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8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3 名。

网址: <http://www.rand.org/>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IGI)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简介: CIGI 是关注全球治理的独立智库, 由 Jim Balsillie 成立于 2001 年。它的主要活动包括资助研究、创造交流网络、促进政策讨论、提高多边治理能力。具体而言, 它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全球经济、环境与能源、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它致力于将学术应用于政治, 通过优秀的研究与分析来影响政治决策。

网址: <http://www.cigionline.org/>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 由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 成立于 1981 年, 是非牟利、无党派在美国智库。2006 年, 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 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PIIE 在全球(含美国) 30 大智库中列第 10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4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 名。

网址: <http://www.iie.com/>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简介: IMF 于 1945 年 12 月 27 日成立, 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 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 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 其总部设在华盛顿。IMF 主要通过监督、贷款以及技术援助和培训三大职能来促成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IMF 的工作论文及其他出版物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方面拥有巨大影响。

网址: <http://www.imf.org/>

Cato Institute 加图研究所

简介: 加图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 成立于 1977 年, 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智库之一。加图研究所以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思想根基, 致力于“扩展公共政策辩论维度”, 通过独立、超越党派的公共政策研究和讨论, 旨在“恢复小政府、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和平的美国传统”。加图研究所的政策分析曾经影响过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政策。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加图研究所在全球(含美国) 30 大智库中列第 14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3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8 名。

网址: <http://www.cato.org/>